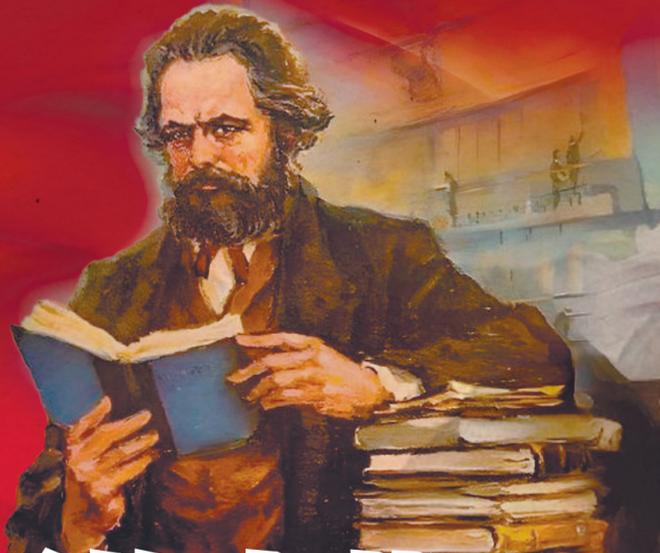




题记：
干将发硎，有作其芒。
——梁启超《少年中国说》



闪耀吧，真理的光芒

——《资本论》首个中文全译本诞生记

□ 李冬明 李芳

11月26日，江西赣州，章江之畔，一幢两层楼的赣南客家民居内，上海韬奋纪念馆（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）副馆长张霞女士不时驻足细看屋内的展陈。一套封面斑驳泛黄、用细纹米色布制成的书籍，引起了她的格外关注。这套书共3卷，封面中间套印3厘米的红带，红带上印着“资本论”三个醒目的大字，庄重美观、落落大方。其上方印着一行繁体小字“卡爾·馬克思著 郭大力 王亞南譯”。

这套书是85年前（即1938年）出版的《资本论》首个中文全译本。这幢客家民居，是翻译者之一郭大力的故居。穿越历史的天空，走进战火纷飞、颠沛流离、追寻真理的年代，让我们重温《资本论》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出版历程，体悟这段至今传为佳话的“传奇”岁月。

1937年秋，刚从战火连天的上海千里迢迢回到故乡的郭大力，仍在专心致志地翻译《资本论》第二卷和第三卷。在赣州南康三江乡斜角村，这间光线较暗的客家民居厢房里，他先译出初稿，再修改、誊清，然后辗转寄往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。为了减轻重量，译稿用最薄稿纸（航空纸）誊抄。

厢房逼仄，外面是天井。每天早上洗漱之后，郭大力翻译2个小时，稍休息后继续工作4个小时，下午工作3个小时。傍晚后，他在田野小路上散步或打理菜园；晚上，再在微弱的桐油灯光下，工作3个小时。天天如此，从不间断。

华北危急！中华民族危急！当时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郭大力心急如焚、瞋目扼腕，但眼前的翻译工作却需要他心静如水、蹙额深思。因为，他深深知道：宣传真理，方可唤起民众；凝聚民心，才能救亡图存。

1867年问世的《资本论》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、最丰富的著作，被誉为“工人阶级的圣经”。然而，历史却未曾料到：70年后，江西西南部一个小村落的这间老屋里，一串串德文单词正变成一个中国方块字，这部“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”的巨著，即将完整地走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

其实，郭大力与《资本论》中文翻译早在1928年就已结缘。“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这部光辉巨著之译成中文，那是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青年的热切期望。”（经济学家许涤新语）这年1月，不久的大夏大学（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）毕业不久的郭大力，从上海来到杭州，栖身于一处偏僻寺院。禅房寂寂，他开始了第一次的《资本论》翻译。郭大力后来回忆说：“大革命失败时，我正在大夏大学读书，又受了李石岑先生的影响。当时思想上震动很大，就下定决心翻译《资本论》。”在寺院，郭大力巧遇大革命失败后愤然离开北伐军的王亚南。两人一见如故，志趣相投，遂计划合作翻译《资本论》。

半年后，郭大力、王亚南翻译完成《资本论》第一卷，然而面对译稿他们却并不满意。马克思为了撰写《资本论》，花了40年时间，读过1500多种文献，其中直接引用的文献达800多种，涉及经济学、哲学、政治学、法学、历史学等领域。翻译这部篇幅浩繁的巨著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两人决定下力气苦修德语，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——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入手，潜心钻研和翻译。随后短短几年间，郭大力独译或与人合译并出版了大卫·李嘉

图的《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》、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、朗格的《朗格唯物论史》、马尔萨斯的《人口论》、约翰·穆勒的《穆勒经济学原理》等一系列著作。

1932年1月28日，淞沪抗战的炮火，将先前翻译的《资本论》第一卷译稿损毁，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们的决心和信念。1935年，郭大力与从欧洲游历回国的王亚南在上海重聚，两人依据由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校正过的最新德文版，并参照了两种英文译本和两种日文译本，再次合作从头翻译《资本论》。

当时，王亚南住在法租界，离郭大力居所相去不远，两人来往密切，翻译工作进展很快。到1936年底，他们已经陆续翻译好了《资本论》的第一卷和第三卷的前半部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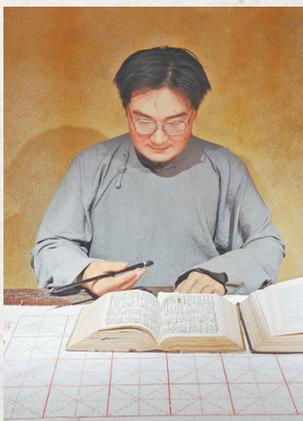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译这部书，并不是因为我已很理解它，也不是因为我已有了超高的翻译能力。1928年，国民党全面背叛了革命，红色政权已在江西建立。当时我只觉得一点：有革命的需要。”谈到翻译初衷，郭大力后来回忆说。

“有革命的需要”！几乎同一时间，上海的一个弄堂里，另一群志同道合的人，怀着同样的信念，也在苦苦追寻光明、宣传真知。

20世纪30年代，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日本军国主义步步蚕食、企图灭亡中国。1936年2月，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静安寺路正式开张，李公朴任社长，柳湜任出版部主任，艾思奇任编辑部主任，汪仑任经理兼业务部主任。同年，李公朴因“七君子事件”被捕，读书生活出版社刊物被封，书籍被禁，营业顿时停滞……在这紧要关头，幸经艾思奇的同乡、同学郑易里及其兄长郑一斋慷慨拿出3000银元接济，并商定邀请正在南京的同乡黄洛峰出任经理。遭此变故重新改组，出版社成立新的董事会，董事长为郑易里，经理为黄洛峰，艾思奇、柳湜任总编辑。大家多次酝酿共同拟定了一个出版计划，第一条就是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，其中首要任务是出版《资本论》。接下来，大家却为找不到合适的译者而发愁：如此浩繁的翻译工程，何人可承担？另一方面，郭大力、王亚南为翻译出版《资本论》与上海几家大书局接洽都碰了钉子，在为找不到出版社而发愁。当时大多数的出版社不愿意冒险出版《资本论》这样一部红色著作。郭大力的生活因出版屡屡碰壁而陷入困境。

此时，与郭大力同为江西人的《读书生活》半月刊编辑夏征农向读书生活出版社推荐说，郭大力和王亚南的《资本论》中文译稿，之前被财力雄厚的出版商拒绝了，读书生活出版社是否愿意出版？艾思奇随即走访了郭大力，并阅读了部分译稿，觉得译稿有相当水平。双方一拍即合。艾思奇回出版社后，大家听了消息都喜出望外，这正是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

得知郭大力、王亚南为了翻译《资本论》常常面临生活困境，出版社特地同他们签订了约稿合同，决定每月预付郭大力、王亚南各80银元版税，以支持他们完成翻译工作；为了使这种支付不受正常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，特意提出2000银元在银行单立账户，作为专门支付译者预付版税之用。张霞女士介绍说，在不久前举办的上海韬奋纪念馆建馆65周年纪念活动上，郑易里的女儿郑



郭大力故居中，郭大力翻译《资本论》的场景还原。

珑把珍藏多年的父亲1937年至1940年间出资支付《资本论》版税，以及购买纸张等正式收据捐赠给了纪念馆。

1937年春，郭大力、王亚南将厚厚的一包《资本论》第一卷译稿交到郑易里手里。随后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全面抗战开始。“八一三”战火随即在上海燃烧。郭大力租住在上海真如火车站附近，伴随着尖锐而急促的防空警报声，日本轰炸机投下一颗颗炸弹，周边爆炸声、尖叫声不绝于耳。为躲避战火，读书生活出版社派专人护送郭大力取道香港、广州，翻越梅关古道，回到当时相对宁静的江西赣州，以完成《资本论》二卷、三卷的翻译，其每月版税则照寄不误。

回到赣南老家后，郭大力把逼仄、低矮的老屋改造成了书房，没日没夜埋头翻译。乡间生活寂寞清苦，但好在还比较安定。

“信、达、雅”是翻译工作的三道难关。在翻译中，郭大力极其严谨细致。为使译文准确符合原意，他字斟句酌，一丝不苟，做到译文尊重原文。他立足当时中国经济社会背景，广泛吸收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通行的经济学术语，语言采用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白话文，使翻译更易为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。

国难当头，同仇敌忾。那段时间，艾思奇秘密去了延安，王亚南先后到武汉和重庆，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。本着“在抗战中求发展”的方针，读书生活出版社决定西迁，黄洛峰去武汉开拓新局面，郑易里则留守上海“孤岛”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《资本论》的翻译出版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中。

郭大力，在赣南；王亚南，在重庆；黄洛峰，在武汉；郑易里，在上海；艾思奇，在延安——85年后的今天，当我们完整拼接这张“地图”时发现：《资本论》的翻译出版，涉及面广、历程之曲折，令人惊叹。

1938年4月，《资本论》第三卷翻译工作接近尾声。由于战争原因，上海的纸张、印刷等价格较为低廉，出版社决定选择在上海出版《资本论》。一天，郭大力接到郑易里发来的电报，请他速去上海，共同处理译稿的排印等出版事宜。郭大力非常高兴。从江西到上海，要经过战区，途中极其危险，但他毅然前往。

上海静安寺路斜桥弄71号，这里是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办公地点。出版社坚守“孤岛”，出版工作仍在进行。郭大力住在郑易里腾出来的一个小房间，一桌一椅、一张行军床。任务紧急，他一方面要赶译《资本论》第三卷尚未译完的部分，一方面要负责全部译稿（包括王亚南所译部分）的统稿、校订工作，同时还要审阅新排印出来的校样。郭大力日夜不停地工作，经常彻夜不眠，饮食更无定时。

正值盛夏，审稿、校订、排版、印制……大家在闷热的办公室里挥汗如雨，不舍昼夜，全身心地投入了“突击”出版。经过4个多月高度紧张的工作，180多万字的三大卷《资本论》中文全译本，终于在1938年八月间出版了。这个版本的装帧按照郭大力的意见，尽量和德文原版保持一致。《资本论》在问世71年后，其中文全译本在抗战烽火中，首次以完整面貌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。黄洛峰看到样书时，激动得高声叫喊：“呵！这部伟大著作的全译本，终于在中国问世了！”他立即给在延安的艾思奇写信，告诉他这个特大喜讯。

郭大力在《资本论》中文全译本《译者跋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们的工作，虽曾因‘八一三’的炮火而延迟，但是，读书生活出版社负责人郑易里、黄洛峰二先生促其早日付印的好意，终于把一切的困难克服了……”

“让思想冲破牢笼！”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尝到了“真理的味道”。

四

真理烈火，照亮人间。

当《资本论》中文全译本在上海付印时，人们奔走相告。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争相订购，宋庆龄、冯玉祥、邵力子等各预约了一套。为满足读者需求，装在20个大木箱中，经由海路，绕道香港，计划经广州转送至桂林和重庆大后方。未曾想到，运输途中，遭遇日军空袭，毁于战火。出版社随即再加印1000套，由郑易里专程护送，绕道湛江，成功送到了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。收到书，大家像打了一个大胜仗那样欢欣鼓舞，一边翻着书，一边唱起《国际歌》来。

“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，趁热打铁才能成功！”为了让延安读者尽快看到《资本论》中文全译本，黄洛峰安排两个“直送渠道”，确保能够顺利送达：一路是，先让桂林分社联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，将书装在卡车上最保险的位置，直赴延安。另一路，这部书籍运抵重庆后，拣出一部分，作为一项任务专送延安。

《资本论》中文全译本抵革命圣地延安后，很快送达毛泽东手中。他仔细地阅读，并细致地做了圈注和笔记，还作了批注：“1938”（上海出版日期）“1867”（欧洲出版日期）“在71年之后中国才出版”。

1941年，毛泽东在《关于农村调查》中指出：“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，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，然后加以综合，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。”……“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，要为真理而斗争！”

热风冷眼

人生何妨“迟桂花”

□ 万芸芸

张爱玲有句名言，被许多人追捧——“出名要趁早”。是呢，初看“章”字，立早为“章”，似乎古人也在劝人要早早地立言立功呢？

当前，文艺创作愈发开放多元，诸多青年才俊脱颖而出，早负大名。这些“别人家”的孩子，或在网络文学平台，以“大神”之姿霸榜文学榜单；或在选秀节目中出道即巅峰，应接现场人山人海；或在银屏上一眼千年，迅速晋升娱乐圈“顶流”；或在自媒体平台热度飙升，圈粉万千……

“早起的鸟儿有食吃”，早早地定下目标，并为之矢志奋斗，又能遇上千载难逢的好时机，早早实现心中所愿，这多么令人艳羡与钦佩。然而，现实世界天才毕竟是极少数，更多的是在平凡岁月里一步一步成长的普通人。

创作少有捷径可抄，生活是文艺创作唯一的源头活水。树梢的一只鸟，窗外的一棵树，桥上的一个人……那只小鸟如何鸣叫、如何振翅，那棵树几时在风里飞扬，几时在尘土里安眠，桥上的人在干什么，楼上的人又在干什么？世界无限，时间无限，美需要时间来孕育，需要时间来绽放，也需要时间来发现。巴金流连南国水乡多日，写出了《鸟的天堂》；三毛感受着撒哈拉沙漠的荒凉与壮美，为自己写了首《如果有来生》；卞之琳对瞬时的感触，延展成无意味的《断章》……

12世纪波斯诗人安瓦里曾说：“诗人不到五十岁，不要写诗。我从五十岁以后才知道做人的味道。”他还幽默地告诉读者：“你们现在便宜了，有只老羊在前面走，我年轻时糊涂啊，没人可问。”岁月有情，经历过的点点滴滴会慢慢沉淀，化作春泥，滋养人生之树。经历会让人站得高、看得远，让人的眼光有穿透的力量。

同样，创作需要时间去酝酿、发酵，作品需要时间去解读、传播。中世纪波斯诗人纳兹尔·霍斯鲁有诗云：“你的灵魂是一本书，你的行为是书的字句。除了妙语警句，不要写别的东西在你的灵魂上。啊，兄弟，把美好的写下来吧，因为笔就在你手中……”只有凝萃了生命哲思，引发情感共振的真诚之作，方能穿过时间的罗网。那些仓促的粗糙之作，甚至为尽早出圈在题材上打擦边球、在形式上走偏门、在思想上走极端的话题之作，或许能风行一时，却终将行之不远，折戟于茫茫艺海。

实际上，在人生中，在创作中，很多东西悟得迟，来得也迟。

1932年，郁达夫去杭州参加好友婚礼，写下了其最精致成熟之作《迟桂花》。不同于年轻时的“沉沦”“苦闷”，这篇小小说透出清新的桂花馨香。他的好友出身书香门第，早年与他同留日本，后来家道中落，患病辍学，回老家当了名小学老师、静心养病……空山静夜，郁达夫在一种撩人的桂花香气中沉醉。那是迟桂花的香气，“因为开得迟，所以日子也经得久”。

仰望中外文学高山，晚成的作家漫山遍野，还有许多大家老年近花甲才拿起纸笔，写出许多“迟到的”经典：丹尼尔·笛福59岁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；塞万提斯58岁时发表了《堂吉珂德》；在乡村沉潜多年后，50岁的陈忠实地写出了垫棺作枕之作《白鹿原》……

《说文解字》释义，“章，乐竟为一章。从音，从十。十，数之终也”，而“音，声也。生于心，有节（即节奏旋律）于外”。换言之，立早非“章”，音十为“章”，完整地呈现那些承载人们情感的美妙旋律，才是“章”的原义。

90多年前，郁达夫在火车上与好友挥手告别：“但愿我们都是迟桂花。”前些日子的是英雄城，暖阳催开了第二茬绽放的迟桂花，翠绿的树枝上又开始团团金黄。艺术家的创作，作品的生命，就像一条溪流，“流水不争先，争的是滔滔不绝”。时间会带来最好的作品，也会带来最懂作品的读者。我们不妨慢下来、静下来，对自己说一句，“但愿我们都是迟桂花”。

